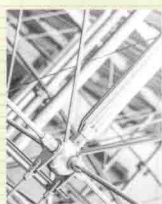


嵌生、冲突、转型

——一个污染企业发展路径的社会学解读



Fusion,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a Contaminativ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Path

方小玲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嵌生、冲突、转型

——一个污染企业发展路径的社会学解读

Fusion,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a Contaminative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Path



方小玲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嵌生、冲突、转型：一个污染企业发展路径的社会学解读 / 方小玲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308-15010-1

I. ①嵌… II. ①方… III. ①蓄电池—电气工业—环境污染—污染防治—研究—浙江省 IV. ①X773
②X322. 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416 号

嵌生、冲突、转型——一个污染企业发展路径的社会学解读

方小玲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64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010-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 书中的字母代号一览表

A 县:浙江省的蓄电池强县,故事的发生地。

B 先生:本文故事的主人公,蓄电池上市企业的掌门人,历经千辛万苦艰难创业。

C: B 先生所在村的支部书记。

D:最初创业时,借钱给 B 先生,一起与 B 先生创办蓄电池企业的元老级人物,在企业内被称为无冕之王。

H:普通村民,T 企业的一名工人。

I: T 企业的办公室主任。

J:普通村民,不在 T 企业上班。

K:普通村民,1995—2000 年在 T 企业上班。

L 村: T 企业所在的自然村。

M: L 村所在的镇党委副书记。

N:普通村民,1995—2003 年在 T 企业上班,4 岁的儿子检查出来铅严重超标。

O 先生: A 县原县委书记。

P 先生: A 县质监局稽查大队工作人员。

Q 镇: 2005 年后 A 县新成立的工业园区。

R 镇: 2005 年后 A 县新成立的工业园区。

S: A 县的一家蓄电池企业,总经理为 U 先生。

T 企业:指代这家从 A 县 L 村走出来的著名蓄电池企业。

V 先生: T 蓄电池企业办公室副主任。

W 先生: L 村普通村民。

X 大伯: L 村一年迈的老人。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001
第二节 调查对象介绍	004
一、A 县介绍	004
二、L 村介绍	004
三、T 企业以及所在的 A 县蓄电池产业介绍	005
第三节 相关文献回顾	008
一、环境社会学理论综述	008
二、由污染向生态转型的社会学研究	012
三、其他可借鉴的研究理论	016
第四节 研究方法	020
一、RRA 法	021
二、田野调查法	021
三、资料收集方法	022
四、分析资料的态度和研究的视角	023
五、理论分析过程中运用的方法	024
第五节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025
一、研究思路	025
二、研究主要内容	026
第六节 研究意义	030
一、理论意义	030
二、实践意义	031
第七节 主要创新点	031

第二章 从创业初期到黄金阶段(1988—2000 年)	033
第一节 创建初期:目标一致,同舟共济	035
一、农民的分化:无土与有土	035
二、村集体的存在和支持	038
第二节 发展初期:从依托村落社区到走出村落,各方平衡的时期 (1988—2000 年)	039
第三节 小 结	052
第三章 发展中期:对立冲突,不可调和(2001—2005 年)	053
第一节 积累的污染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054
第二节 村民的环境抗争过程	055
一、各种途径的弱抗争	056
二、强抗争:集体行动	059
三、蓄电池企业发展中期集体行动为何发生	061
第三节 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各方角色与关系	068
一、各方的角色与利益	068
二、各方的关系	073
第四节 小 结	076
第四章 发展后期:共生共荣,创新共赢(2006—2012 年)	078
第一节 A 县蓄电池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078
一、产业梯度性转移	078
二、产业集聚化	079
三、产业园区化	080
四、产业生态化	080
第二节 “8·20 事件”后 A 县政府的策略选择	081
第三节 T 企业在集体事件后的环保行为及原因分析	095
一、T 企业在集体事件后的环保行为	095
二、T 企业在集体事件后环保行为的原因分析	098
第四节 在集体事件后民众的行为选择	101

第五节 蓄电池 T 企业的地方性贡献	103
第六节 小 结	105
第五章 蓄电池 T 企业发展路径的社会学解读	106
第一节 转型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制度困境使然	107
第二节 产业发展初期利益相关者社会关系的特征与机理	109
第三节 产业发展中期利益相关者社会关系的特征与机理	111
第四节 产业发展后期利益相关者社会关系的特征与机理	113
第六章 构建污染企业社会干预的复合治理路径	118
第一节 产业场域新秩序的形成:复合治理结构	118
一、秩序重构的理论依据	118
二、秩序重构的现实可能:原有产业秩序结构与边界的扩展	122
第二节 多方参与的复合治理机制	128
一、政府、企业、民众三者的反思	129
二、社会干预下的复合治理机制建立	129
三、复合治理机制的内涵:制衡、协调、合作	132
四、重建权力秩序:合法性基础和能力建设	134
第三节 建构复合治理的现实困境:社会组织作用缺失洞	135
第四节 小 结	136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137
第一节 结 论	137
第二节 展 望	138
参考文献	140
术语索引	147
后 记	149

图表目录

图 1.1	本书的篇章构成	026
表 1.1	2006 年 9 月以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001
表 1.2	2012 年 A 县 25 家蓄电池企业按规模分布	007
表 2.1	企业不同阶段的基本表现形式	045
表 4.1	铅蓄电池厂的卫生防护距离	087
表 5.1	蓄电池产业利益主体社会关系演变	11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日趋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却导致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笔者简单整理了 2006 年以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环境污染事件(表 1.1),可以看到很多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都和经济生产有关系。这似乎透露出一个逻辑:经济生产是导致这些环境污染的元凶。

表 1.1 2006 年 9 月以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年份	事件	社会经济影响
2006	湖南岳阳砷污染事件	县城饮用水源地新墙河发生水污染事件,砷超标 10 倍左右,8 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和影响。
2007	太湖蓝藻事件	水危机扰乱数百万人的正常生活,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2008	广州钟落潭污染事件	41 名村民在自家或在饭馆吃过饭后,不约而同出现了呕吐、胸闷、手指发黑及抽筋等中毒症状。
	贵州独山砷污染事件	患轻度砷中毒病人 13 例,亚急性砷中毒病人 4 例。
2009	江苏盐城水危机	盐都区、亭湖区、新区等部分地区发生断水,两自来水厂关闭,矿泉水 10 分钟涨价两次,当地至少二十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直到 2 天之后,才恢复正常供水。
	内蒙古赤峰市水污染	水污染直接导致接受门诊治疗人数达到 4020 人,其中住院留观 88 人。

续表		
年份	事件	社会经济影响
2009	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851 人血铅超标,其中 174 名中、重度铅中毒儿童需要住院进行排铅治疗。村庄需要整体搬迁,而居民搬迁需要 4 年时间。
	湖南武冈儿童血铅中毒事件	80 多个儿童出现血铅超标症状,其中高铅血症 38 人,轻度中毒 28 人,中度中毒 17 人。
	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	工厂排放镉超标,导致环境污染。截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在已出具的 2888 人的有效检测结果中,尿镉超标 509 人。数千群众上街抗议。
	湖南嘉禾儿童血铅超标	截至 2010 年 2 月 24 日,湖南嘉禾县被曝 250 名儿童血铅超标。污染企业附近泥土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 5.52 倍,砷超标 2.1 倍,镉超标 0.6 倍。
2010	湖南郴州铅污染	从 2010 年 3 月 17 到 22 日,郴州市两家血铅定点检测单位共接待了 285 人检测,其中血铅超标人数为 152 人,血铅中毒人数 45 人,均为 14 周岁以下儿童。其中 30 名血铅异常儿童住院治疗。
	浙江台州铅污染	台州市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引起的铅污染造成当地三个村庄 168 人血铅超标。
2011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	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把 5000 吨铬渣倒入水库,致使水库致命六价铬超标 2000 倍。
	甘肃徽县血镉超标	甘肃宝徽实业集团为公司 869 人进行体检,其中 266 人血镉超出标准,其中 71 人住院治疗。
2012	广西龙江镉污染	正值农历龙年春节,广西龙江河拉浪水电站网箱养鱼出现死鱼现象,200 米水质重金属超标 80 倍,沿岸及下游居民饮水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江苏镇江自来水污染	水源受到苯酚污染
	天津 PC 项目污染引发群众“集体散步”事件	中石化集团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中沙公司,各自持股 50%,上马年产 26 万吨聚碳酸酯(英文缩写 PC)项目。天津大港人认为 PC 是一个剧毒项目。而项目 5 公里内,居民区众多,距离项目最近的只有 1670 米。
	2012 年冬季:全国大范围出现雾霾天气	

续表

年份	事件	社会经济影响
2013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惊现“牛奶河”	2013年4月,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工矿业排放的尾矿水,直接注入当地的河流中,引发了周边群众灌溉用水危机。违法企业向河流排放的是黄原酸盐,危害水生物,淤塞河流、湖泊。
	广西贺江水污染事件	2013年7月,贺江贺街至合面狮水域陆续出现死鱼现象。检测得知水质镉超标1.9倍,铊超标2.14倍,下游贺州市信都镇、广东肇庆等地存在饮用水安全隐患。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网、新华网、南方网、中国广播网(2006—2013年)整理。

整个社会似乎也正是在经济生产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元凶这一逻辑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由居民自发发起环境抗争,并都以驱逐污染企业或迫使其停止生产项目为主要目标,认为迫使企业搬迁就是胜利。而这种迫使搬迁的处理方式,在一些产生有毒性污染的事件中更为常见,因为中毒事件往往最能给受污染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也最能让群众真切体会到污染的危害。于是,这些事件更能激起居民的愤怒,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和危害。

面对这些事实,笔者不禁产生疑问:经济生产和环境污染是否有必然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悖论吗?经济生产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必然由经济生产导致?搬迁式的环境抗争是否真正解决了环境问题?污染事件的始作俑者——企业又是如何面对民众抗争甚至暴力冲突等恐慌性事件的?在后污染时代,这样的企业是必然走向破产,还是能够技术升级、产业转型,实现凤凰涅槃呢?如果能够重生,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社会性力量又是什么呢?经济生产与生态环境如何才能和谐共处?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选取了浙江A县L村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地点,从社会学角度探究一个污染企业成功转型发展的路径轨迹。

A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浙北小县,2002—2006年期间,蓄电池产业生产带来的铅污染风险“阴影”也曾一度笼罩在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心上,为此甚至还发生过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A县L村有一蓄电池T企业,从小山村走来,如今已是A县蓄电池产业的领头羊。2005年,T企业的蓄电池生产致使周边儿童血铅中毒剧增,关于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T企业,外界传言总

说：“这次在劫难逃了。”但是如今的蓄电池 T 企业并没有搬离当地，而是以一种生态转型的姿态华丽转身，重新定位经济生产，甚至走向国际，成功上市，铅酸污染的问题似乎也得到了解决。这些都让研究者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其他污染事件的个案，也似乎看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于是，带着“把事情搞清楚”的决心，笔者进入了田野。

第二节 调查对象介绍

一、A 县介绍

A 县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位于浙、苏、皖三省交界处，东临太湖，西倚天目，南望杭州，北接苏州。1965 年县内已通公路，航道通航里程 262 千米，交通网络包括两条国道、两条高速公路、三条铁路大动脉和一条黄金水道，交通十分便利，物流也发展迅速，已成为浙、苏、皖的物资“中转站”、三省毗邻地区的贸易中心。A 县全县面积 1430 平方千米，辖 10 镇 6 乡，现有人口 62 万。在 62 万人口中，除 40% 当地人口外，还有来自河南、江苏、安徽和浙江建德和温州的居民^①。

二、L 村介绍

T 企业所在的 L 村，处于 A 县的北部区域，是一个典型江南水乡的自然村落，地理位置偏僻，交通状况不十分理想，有大山掩映，山上翠竹葱茏，一条公路与外界相连，村庄西边有一条小溪涧流过。村庄现有农户 220 余户，人口 906 人，拥有可耕地、林地、山地共计 5000 余亩，村民 2005 年人均收入就已经突破了 10000 元。如今，村集体固定资产累计达到 5000 万元，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500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15400 元，该村先后获得“浙江省村镇建设明星村庄”、“浙江省科普先进村”、“浙江省绿化示范村”和“湖州市经济发展一级强村”、“明星示范村”、“小康村”等荣誉称号^②。

① 资料来源于 A 县县志。

② 资料来源于 L 村村支书 C 先生提供的村集体材料。

三、T 企业以及所在的 A 县蓄电池产业介绍

新中国成立初期,A 县境内、L 村附近有一大型国有煤矿,工人下井挖煤需要矿灯,L 村所在的镇就建立了一个生产配套矿灯的厂家。矿灯需要使用蓄电池,一些生产蓄电池的村办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T 企业前身也是煤矿附近众多村办企业之一。这家生产蓄电池产品的村办企业创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中期濒临倒闭,1988 年由村内能人、当地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属于农村知识分子、精英一类的 B 先生承包。企业最初规模仅占地 2.5 亩,除了生产数量不多的矿灯蓄电池外,还生产汽车电池、摩托车电池,90 年代初电动自行车被老百姓广泛认可,形成市场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的膨胀性需求,T 企业也转而生产电动自行车所需的铅酸蓄电池,业务量急增。到 21 世纪初,随着业务量呈几何数量增长,T 企业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大量铅酸,使得周边土壤、空气、水源等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质由Ⅱ类、Ⅲ类恶化为Ⅳ类、Ⅴ类,土壤重金属超标 10 倍^①。2004 年伊始,L 村及周边村落的儿童就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血铅中毒现象,2005 年出现儿童集体血铅中毒事件,T 企业和周边民众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民众强烈要求企业搬离 L 村。在政府的强力干涉和市场机制的正面引导下,T 企业转型升级,通过设备改造、技术提升、规范管理、研发新产品等措施,取得了环境污染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双丰收。如今,T 企业厂区内的水质已经修复到国家地表水Ⅱ类以上标准,周边土壤、空气质量明显提高;同时 T 企业以及配套生产的厂家在当地农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为当地社区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责任。

T 企业在螺旋式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就:1995 年改良创新电力铁路机车用“免维护”蓄电池,1997 年研发“电动助力车专用蓄电池”,两次被评为国家级科技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将企业带入高速发展之路。2000 年和 2001 年该厂的产品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电动车里程大赛唯一指定产品”,电池使用寿命由两三个月提高到六个月,后又改进为一年甚至两年多。2001 年成功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再一次领先全国,巩固了公司的市场领导地位。2003 年快速发展,开始策划上市,加大

^① 引自 A 县环保局 2003 年的材料记载。

对外投资规模,招商引资。2004年在行业内率先进军新型能源领域,先后涉足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等新型能源领域。2005年起电动车电池生产量达到全国第一,连续11年蓄电池的销售量保持全国第一。2007年6月11日,公司以“中国动力电池第一股”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成为湖州市首家境外上市公司,在湖州制造业中排行第一,2010年成为上海世博会供应商之一,至今雇用职工达到3万多人^①。

笔者的研究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7月,L村邻近村庄都出现儿童集体血铅中毒事件,村民被迫抗议T企业的污染,引发集体暴力冲突。民众、政府、企业的三者对立给村落和历史都留下很深的记忆,至今村民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很多关于蓄电池发展路径中烙下的口述资料和符号系统^②。在与村民的访谈过程中,时时可以感受到企业发展带给村庄欣喜的变化,但是污染在当地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当时笔者下了肯定性的结论:T企业从此会销声匿迹。但2005年后的它不但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发展得还更加蒸蒸日上。如今L村的村民就业、村内的铺路造桥等公共事业、村内60岁以上老人的福利保障等,都离不开T企业的鼎力相助,L村已成为深受T企业影响甚至高度依赖企业发展的区域社会。

A县县域内蓄电池生产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40来年的发展,产业渐趋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前,A县境内的水域清澈见底,环境污染闻所未闻。蓄电池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矛盾在2005年集中爆发,民众、企业、政府严重对立,政府强拳出击,用铁的制度约束整合产业的发展。通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和政府的正确引导,经过两年时间,至2007年,A县蓄电池产业日渐规范有序,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伴随着蓄电池市场的持续升温,A县蓄电池产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品牌优势明显,在全国的蓄电池生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2年,A县蓄电池产业集群特征明显,竞争力不断增强,每年产品市场销售量以年均70.9%的幅度增长,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5%。2012年在T企业的带动下,A县全县出现了爆发式增长,1—8月铅蓄电池行业实现产值138亿元,同比增长116%;销售收入实现194亿元,同比增长109%,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65%,是名符其

① 资料来源于T企业办公室主任提供的材料。

② 资料来源于村民访谈。

实的“电动自行车铅蓄电池之乡”。全县的铅蓄电池企业数量,从2004年的175家锐减至目前的25家。尽管企业的数量骤减,但行业的集中度得到提升。铅蓄电池组装产量从1525万只增长到11300万只;销售收入从17.3亿元增加到173.5亿元;产值从3亿元增长到300多亿元。2010年产值达到并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两家,仅这两家所创造的产值就达到整个行业产值的64.2%,在整个行业中绝对是蓄电池领跑者;同年,产值达到15亿元的企业有七家,这七家企业所创造的产值为整个行业产值的33.6%。这些企业分布在A县新能源高新园区Q镇和R镇两大工业园区,从业人员将近七万人^①。T企业是A县整个蓄电池产业发展—整治—转型成功一路走来的是一个缩影。

表 1.2 2012 年 A 县 25 家蓄电池企业按规模分布

产值规模	100 亿以上	15 亿	1000 万~5000 万
企业数(家)	2	7	16
产值(亿元)	200.4	105	6.4
产值占比	64.2%	33.6%	2.2%

目前,A县全县的蓄电池产业已经从经济与环境相克转型到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从低附加值转型到高附加值,在A县的工业布局中呈现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景象。A县相继被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绿色动力能源中心”、被浙江省工商局授予“浙江省蓄电池专业商标品牌基地”、被浙江省科技厅授予“电动助力车用蓄电池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等称号。

蓄电池T企业以及产业发展的辉煌令人鼓舞,但2004年后的两三年之间,由于铅污染引发当地整治蓄电池产业的大风暴让所有的A县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企业发家史、县域产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强吸引力的、未曾耳闻的“新鲜事”,这也是社会学界鲜有人涉及的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原先的污染产业成功转型升级的一个新领域。笔者意识到,这里面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当即确定了前去做田野调查的意向。2008年6月,笔者带领学生对A县蓄电池产业开展实地调查,辗转至镇、村、企业,以及A县环保局、档案局、政府办公室,首次调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并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蓄电池行业网。

系统地梳理了 T 企业的发展史,以及它与民众、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2009 年 6 月,笔者再次带着学生来到 L 村,对村里的历任村长、村支书又做了深入访谈,从历史的视角审视了 T 企业从 1988 年发展过来的社会性支撑力量。此后的每个暑假,笔者都带着学生对 L 村、T 企业进行回访,倾听当时与 B 先生一起创业的“无冕之王”D 先生述说 T 企业的成长史,倾听创始人 B 先生回忆一路走过来的酸甜苦辣。

经过历次田野调查,笔者探究了企业、民众、政府三方作为产业发展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表现和行为背后的原因推手,不仅梳理了 A 县蓄电池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机制,还透过现象去探索升级背后的社会性力量,希望借此寻求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

第三节 相关文献回顾

20 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就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和产业转型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痛苦历程。中国一直希望能不重蹈覆辙,但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往往会造成一些环境上的欠债,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关心的内容。

学界中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阵地在环境社会学,故而本研究首先要回顾环境社会学的有关研究和理论。另外,产业转型中由污染向生态转型的问题也是本研究的核心,对其也将做相关的回顾。

一、环境社会学理论综述

环境社会学兴起于美国,社会学家 R. E. Dunlap 和 W. R. Catton(1978)撰写的论文“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公开发表,标志着环境社会学正式形成。在亚洲,日本的环境社会学较为成熟,日本在 1990 年就成立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会(饭岛伸子,1999: 2),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零星的研究。随着 2007 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门新兴学科步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是环境社会学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理论色彩仍略显薄弱。纵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路程不难发现,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普通社会社会学理

论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基于广义角度而言,环境社会学首先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而后对社会如何面对、处理环境问题的全部体制性问题进行一体化思考:①研究主题是环境与社会,并且着重突出环境因素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②通常会采用包括生态学探究模式或系统科学探究模式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对该主题进行相关分析研究。③所发展理论逐步趋向提高适用性,并且将其理论与环境、社会相靠拢(洪大用,1999)。

(1)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在环境社会学诞生之初,“环境—社会”关系就被认为是基本研究主题。如 Catton 和 Dunlap^①(1978a)认为,环境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但该观点还并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早在 1972 年,Schnaiberg 的非正式发表论文“环境社会学和劳动分工”(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中就已提出了(转引自 Catton & Dunlap, 1978a)。三年后,Schnaiberg (1975)在《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发表的论文中,再次明确提出“社会—环境”辩证关系(Societal-Environmental Dialectic)^②。

Dunlap 和 Catton(1979)指出,环境社会学涉及这种认知,即自然环境能够影响(反过来也能被影响)人类社会及其行为。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最初也是以“环境—社会”关系为视角的,日本著名学者饭岛伸子(1999)是这样概括定义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关系复杂、涉及范围广大的学科,主要对整个人类的生存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环境社会学是以研究这种非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宗旨的。

“环境—社会”关系也是中国社会学家阐释环境问题的切入点。比如,郑杭生(2007)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论述了“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① 在环境社会学界,Dunlap 一般被认为是环境社会学之父。事实上,早期 Catton 影响力和贡献更大些,这从他们早期合作发表文章中的署名顺序亦可看出。不过,就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而言,Dunlap 的学术贡献更大,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学者,研究著述十分丰富。

② “社会—环境”的核心辩证关系是:(1)社会的经济扩张必然要求增加对环境的索取;(2)对环境索取的增加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问题,包括自然生命系统的解组以及固定资源的消耗殆尽;(3)这些生态问题给进一步的经济扩张设下了潜在的限制。